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 “农业三问”有答案了！河南麦收现场见闻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韩朝阳、冯碧箫)夏收时节,记者在河南麦收现场采访发现,通过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紧盯市场需求规避风险,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书写“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的答案。

流转托管 规模经营 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

麦田里“铁牛”滚滚收割忙,62岁的种粮“老把式”曲良贵算起经济账,收一季小麦毛收入约1000元钱,除去农资成本、农机费用,收益大概400至500元钱,如果再细算人工成本,收益更加微薄。

“种地又苦又累,还不挣钱,年轻人都不愿种地。”由曲良贵所在的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谢营村有近5000亩耕地,如今,村里还种地的农户多是像曲良贵一样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

曲良贵也曾困惑,等到干不动了,自家的13亩地由谁来种?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后,他逐渐看懂了一些门道。两年前,河南文景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村里以托管形式集中土地,曲良贵将2亩多地托管给公司,由公司统一经营管理,自家享受分红。“一亩地一季保底能分400多元钱。”曲良贵发现,当起“甩手掌柜”

后,种粮收益一分不少,他正计划将余下的10多亩地都托管出去。

“传统散户种粮收益微薄,适度规模经营却效益可观。”河南文景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旭宁也算了一笔账,该公司流转4万余亩土地种粮,规模经营后成本大幅下降,除给农户的分成,1亩地每年仍余300至400元收益,公司全年营收过千万元。

“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激起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以托管、流转形式集中土地的速度正在加快,适度规模经营渐入人心。”南阳市宛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天海说,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这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可行之路。

分工协作 要素匹配 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老话虽好,但传统散户种植和适度规模经营遵循的规律大相径庭。

“种10亩地和种1000亩地完全是两个概念。”2017年,在河南郑州经营企业的刘飞看好农业发展前景,成立了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趁着“三权”分置的东风,首批流转5000

亩土地种粮食,却因不懂技术、不会管理、不善经营,第一年赔了300余万元。

身为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刘飞,开始思索工商资本下乡后到底该怎么种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刘飞决定自己的管理团队主要负责市场对接和农事管理,整地、播种、收割、植保等农业生产环节交由专业的农业服务组织完成。

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刘飞解决“怎么种地”问题的得力帮手。凭借160余台(套)农机和专业机手团队,该公司能为客户提供整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运输等一体化、精细化全程服务。

双方携手之下,乡村麦田成为“露天工厂”,刘飞投入资金、管理,制定耕作标准,首邑农业投入技术、设备,完成作业任务。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兴新说,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聚集,并合理配置,“怎么种地”的问题也随着农业生产分工细化、相互协作逐步解决。

市场导向 规避风险

回答“如何种好地”的疑问
“种子买到手,技术跟着走,良种配良方,

丰收有希望。”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符已从业34年,“良种、良田、良方、良制”是一代代农业工作者总结流传下来的丰产“秘诀”。无论是“老把式”,还是“新农人”,都对此“秘诀”深感认同。

不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农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在注重良种选择、土壤改良、配方施肥等丰产“秘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市场导向,更加注重规避风险。“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以销定产,甚至以产招商。”目前,刘飞和景旭宁大规模流转、托管土地后,全部发展订单农业,并通过集约化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物品质,增加产出收益。南阳市宛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李祥惠说,订单农业影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追求高产,更追求优质,有望带动粮食品质再上新台阶。

同时,为了降低天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景旭宁通过购买农业保险为企业保产增收增加一道“安全阀”。“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智慧农田建设,进一步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景旭宁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河南有近1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8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土地托管服务,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候鸟麦客」

▲5月29日,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南陵村的一处麦田里,秦印红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眼下正值“中原粮仓”河南的麦收时节,51岁的秦印红“麦客”这行已经20多年。今年,秦印红的麦收迁徙从5月20日开始,“我们第一站是南阳,然后到平顶山,现在在周口,在这干完就到新乡,最后回河北,一趟下来差不多20多天。”秦印红说。大部分时间,秦印红和同伴以车为家,吃住都守在收割机旁,“刚干‘麦客’那会儿机器不行,又脏又热,现在开的都是带空调的联合收割机了,速度快还不受罪。”

新华社记者李安撰

一个村庄的“一毛钱工程”美颜记

走进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下坑村,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映入眼帘,平整的水泥路上干干净净,往日村民房前屋后堆放的大件杂物、废弃物已不见踪影,村里各个垃圾桶也不再被垃圾包围。

然而,几个月前的下坑村还是另一番景象。“村里大件垃圾到处都是,不仅村民房前屋后随意堆积,村里道路两旁也是常见,一些垃圾回收点也常被大件垃圾包围。”下坑村党支部书记林永前说。此外,还有秸秆、建筑垃圾严重影响村容村貌,每次清理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林永前算了一笔账,2019年村里清洁工作花费了3万多元,光是额外请人请车处理这些大件垃圾就花了大约7000元,这对集体经济收入不高的下坑村是个不小的挑战。

事实上,从2019年开始,下坑村就通过区财政支持、镇级清运服务配套、村集体出资聘请保洁员的形式,形成了生活垃圾保洁制度。保洁员有了,村民的环保意识没有上来,始终

上不去的村容村貌成了下坑村两委的心病。如何激发村民意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里公益事业,成了破题的关键。下坑村两委开会分析后得出结论:建设美丽乡村人人都要参与,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每个家庭都需要有“付出”。

今年3月,武江区推行村容村貌整治提升打掃比武活动。下坑村结合区里政策要求,探索实施“一毛钱工程”:户籍在本村的村民,每户每月向村委会缴纳3元卫生管理费,此外,户籍不在本村的村民,每户每月缴纳5元钱,村里小商贩每月缴纳10元钱。

村里还规定每周五下午是全村大扫除的日子。村民家有大量垃圾物品要丢弃的,明确先存放在家,报告村小组后,由村委会在周五下午安排车辆上门收运,并按分类进行处理。

开始推行时,村两委担心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但没想到的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政策后,村民积极性非常高,原本计划每月收一次费用,很多村民直接交了一年的钱。

“全村240户本村村民、50多户非本村户籍的村民,还有10多家商户,基本上都交了一年的管理费。现在已经收了11224元。”林永前说。

骆春霞的家在村里主干道上,她家门口一间房被人租去开液化气店,她帮助老板打理店铺。“我们家交了36元,商铺交了120元。我们都十分赞成这个计划,因为这是方便我们自己,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人活得更开心一些。”骆春霞说,自从村里开展“一毛钱工程”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村里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邻里庭院变得干净整洁了,乱扔垃圾的现象也少了很多。

林永前说:“‘一毛钱工程’不仅为下坑村开展日常保洁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乡亲们参与村庄清洁工作的主人翁意识。”

目前,西河镇已经计划将“一毛钱工程”在全镇推开。(记者李雄鹰、胥兆瑞)新华社广州5月31日电

百年桑葚出山记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天津市蓟州区于桥水库南岸的红花峪山谷,看到漫山遍野的桑树翠绿欲滴,绿叶后颗颗诱人的桑葚挂满枝头。

沿着宽阔弯曲的山路前行,尽头便是别山镇西史各庄村村民间素美的桑葚采摘园,三五成群的游客正在斑驳的树影下采摘。

闫大妈和家人正忙着打桑葚、装箱,一旁的游客排队等着购买新下树的桑葚。“今年桑葚又是大丰收,我们的桑葚不仅个大饱满,吃起来还甜美多汁。”闫大妈笑道。

闫大妈觉得村里去年修的宽马路给大家伙儿办了实事,“自从修了这条宽马路后,采摘游客的车开进来,也方便桑葚卖出去。”

不少游客也表示,之前来村里采摘走的那条山路不好走,不仅窄,还绕远,路上还要翻山梁,现在这条路又宽又平坦,好走多了,带家人来采摘方便不少。

“我们村的桑葚种植历史悠久,房前屋后、山坡沟谷都是桑树,其中,最古老的桑树已有700余年,百年以上桑树就有150余棵。”别山镇西史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宏波自豪地说,2014年在区镇的帮助下,红花峪桑葚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5月份至6月底,都有自天津、北京、河北等临近地区的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红花峪山谷与天津市“大水缸”于桥水库一山之隔。为保护绿水青山,蓟州区在开展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工程中,结合西史各庄村桑树种植历史,发展了千亩桑园,在护绿增绿的同时促进了农民增收。

近年来,为了让桑葚走出大山,别山镇政府先是修建了环山公路,方便村民种植收获果实。为促进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2019年别山镇政府又协调相关部门修建了一条1.3公里的柏油路,通达干线公路,方便更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两条路修完,村民的“致富路”更宽了。

镇政府还组织天津、北京的农业专家帮助农户嫁接优良品种。如今,西史各庄村桑树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年产桑葚250余万斤,年产值1000余万元,小桑葚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下一步,村里还打算建立冷库,购置烘干设备,延长桑葚的销售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孙宏波说。

(记者张宇琪)

新华社天津电

山野菜大棚“扣”住了村里的年轻人

新华社长春6月1日电(记者金凤、高楠)36岁的卢兆友没有想到,村党支部书记刘怀习5年前的那通电话,不仅改变了自己在外漂泊的生活,更让生活红火起来。他更没想到的是,村里红火的反季节山野菜棚种植把外出的年轻人都吸引了回来。

在东北农村,搭建大棚种植被形象地称作“扣大棚”。如今,这些“扣大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被大棚“扣”在了家乡。

长白山下的福林村是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的一个普通村屯,这里的169栋反季节山野菜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在卢兆友的大棚里,马蹄叶一片叠着一片,密密麻麻,长势喜人。

卢兆友曾长期在外打工,送过煤气罐,干过汽车维修,一年到头挺辛苦,可手里攒不下几个钱。“打工那阵儿,刘书记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种山野菜,说比打工挣钱,当时我还不信。”他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15年,卢兆友带着家人回到福林村,看到村民种山野菜真挣了钱,随后也加入其中。“一开始租了两个棚种水芹菜和马蹄叶,一年就收入五六万元,而过去在延吉市打工一年才挣两三万元。”几年间,卢兆友的大棚越干越大,现有7个大棚的他年收入近30万元。

七山一水两分田,两山夹一沟的自然条件,曾让福林村的人们一筹莫展。“村里多是山坡地,不适合大面积种植,如果光靠种地连孩子上学都供不起。”脑子活络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怀习领着大伙多方考察后,将目光锁定在了发展特色种植上。他自己则做了村里第一个“扣大棚”的人。

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问题困扰着不少地方,过去的福林村也不例外。“没有劳动力就没有生产力,光靠大爷大妈搞发展怎么可能有未来?必须靠年轻人。”棚膜种植效益越来越好,刘怀习开始琢磨用大棚“扣”住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产业“筑巢”引“凤”归。如今的福林村,除了在外上学和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都回到村里种植山野菜。“全村45户、147人,年收入达到30万元以上的四五户,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近10户。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近4万元,‘超额’完成了整村脱贫任务。”刘怀习说。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福林村的山野菜被“憋”在了棚里,运不出去。菜贩竞相压价,往常20元一斤的山野菜,8元一斤都卖不出去。

如何提高村民抗风险和议价能力,保证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告别小打小闹、单打作战,向抱团发展转变。疫情之下的高考题逼着村民寻找新出路。

事实上,这些年不少村成立了合作社和村办企业助力脱贫,镇里也开始探索村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在4个村试点成

立了5家种植养殖公司,聘请能人经营管理。“明月镇党委副书记沈以耀说,‘福林村也选择了公司化运营这条道,反季节山野菜种植公司目前已注册完,实行村民入股,集中经营。公司除对全村山野菜进行统购统销外,每年还从盈利中拿出一定比例分红,通过销售和分红双重收入保证村民的利益。村集体则提取一定比例利润作为积累,用来发展村里的公益事业。”

对于这家大伙都有份的公司,村里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过去单打独斗是能挣钱,但做不到大家都受益。年轻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富,还要带着大伙一块儿富。”卢兆友说。

山野菜大棚“扣”出了致富路,也“扣”住了年轻人的心。福林村不少年轻人如今过上了城乡“两栖”生活。他们在20公里外的县城置下房子供孩子读书居住,而自己则把精力越来越多地留在村子里,拴在大棚上。

(上接1版)根据方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设立“一线”,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二线”。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胜强说,海关将打造简化“一线申报”,突出岛内经营自由,严格“二线”监管的监管模式,先在洋浦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行后推广到全岛实施,建设高标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形成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必须把准产业发展方向,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推动海南将生态优势和开放优势相融合,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和创新经验,打造包括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在内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区,形成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示范。

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这是基于海南自身条件和国家战略需要作出的精准定位。”李金波说。

在旅游业方面,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加快三亚向国际邮轮母港发展,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打造国际航运枢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服务体系。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培育深海深空产业,壮大先进制造业,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今年1至4月,海南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52.3%,展现独特魅力。2019年,海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75%。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从海南实际出发。”李金波说,坚守绿色和蓝色的自然本底,兼顾海港与空港,打造海南特色的开放型生态服务型现代产业体系。

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治理体系、法治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在众多制度设计中,税收制度备受关注。方案提出,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从方案发布之日起,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税收制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加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离岛免税等政策的优惠力度。

方案明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是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燕生说。

在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伟华看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面积大、开放程度高等特点,处理好“放得开”和“管得住”的关系极为重要。

方案明确了风险防控体系的内涵,强调制定实施有效措施,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风险。

“对海南来说,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巨大机遇,也是巨大挑战。关键要提升自身能力,发挥好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打造解纷“终点站” 避免矛盾“再发酵”

(上接1版)信息技术是支撑,全网格化治理的制度基础则为“最多跑一地”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宁波镇海区,有700多个网格和各类矛盾调处社会组织织就“微治理”大网,接到矛盾纠纷的诉求队伍后,网格员、志愿调解员、公益律师等组成信访代办员队伍提供“下沉”服务,形成全域社会矛盾纠纷的“流动化解”。

浙江省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陈旭堃说,“最多跑一地”就是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方法、技术更好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解决群众不知往哪跑、来回跑、反复跑问题,助推社会矛盾要素治理向纵深推进,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升级版。

据统计,2019年,浙江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全省各中心共受理各类涉疫事项193.9万件次,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整体政府”打造矛盾纠纷调处全链条闭环

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小切口、大治理”式的“最多跑一地”改革,初步实现了矛盾调解纠纷化解从碎片化治理向集成治理、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突击治理向长效治理、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

在改革推进中,浙江整合县级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心、12345等线上线下工作平台或建制入驻,推动“多中心”成为“一中心”。同时整合纪委监委、政法委、信访等部门力量入驻,还积极吸收行业性专业调委会、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社会力量进驻。

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社会治理办主任曾红星说,有的地方同时存在30多条政务热线电话,而且各部门还有不少职责交叉、管辖真空地带,也存在推诿扯皮的情况,“最多跑一地”改革就是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浙江坚持“调解优先、诉讼断后”,建立“矛盾纠纷调处一司法确认一诉讼引导一代理诉讼”的全链条流程,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一体,同时开设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切实为百姓解决困难。

“已经基本形成了矛盾调处闭环。”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党工委委员方敏说,从目前的实践来看,98%以上的矛盾纠纷在村社和镇街一级的矛调中心就能解决,剩下的则通过区县。一些解决不了的个案,则可以走司法诉讼途径。

新华社杭州6月1日电